

孫中山研究口述史

葉選平

廣 深 卷



(中)

◎胡 波 主 編

SUN ZHONGSHAN
YANJIU KOUSHUSHI
GUANG-SHEN JUAN (ZHONG)

南方出版傳媒
廣東人民出版社

孫中山研究口述史

葉選平



廣深卷

(中)

◎胡波 主編

SUN ZHONGSHAN
YANJIU KOUSHUSHI
GUANG-SHEN JUAN (ZHONG)

南方出版傳媒

廣東人民出版社

· 廣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中山研究口述史. 广深卷 / 胡波主编.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6. 11

(孙中山研究口述史)

ISBN 978-7-218-11336-4

I. ①孙… II. ①胡… III. ①孙中山 (1866—1925) —人物研究 IV. ①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0672 号

SUN ZHONGSHAN YANJIU KOU SHU SHI · GUANG-SHEN JUAN

孙中山研究口述史·广深卷

胡波 主编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 肖风华

出版统筹: 柏峰 张贤明

责任编辑: 柏峰 周惊涛

封面设计: 瀚文文化

责任技编: 周杰 易志华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真: (020) 83780199

网址: <http://www.gdpph.com>

印刷: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43.5 字数: 430 千

版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30.00 元 (上、中、下)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 (020-83795749) 联系调换。

目 录

(中)

林家有	001
钟卓安	041
李联海	061
黄明同	077
赵春晨	101
周兴樑	139
邱捷	177



林家有

林家有（1937— ），广东廉江人。196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1963—1976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从事民族研究，后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孙中山研究所所长、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广东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孙中山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等。现任孙中山基金会顾问、中央民革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理事、《孙中山研究》主编等。

主要研究方向：孙中山及清末至民国中国的政治和思想史。

主要著述：《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孙中山与中国近

代化道路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的觉醒》（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孙中山国家建设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孙中山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孙中山社会建设思想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以及《国共合作史》（主编）、《孙中山与国共第一次合作》（合著），主编《近现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丛书》共16部，400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以及多部孙中山研究的论文集。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

时 间：2013年12月17日

地 点：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学历史系会议室

口述者：林家有

采访者：胡 波 赵 军

整理者：胡 波 张贤明 肖骏峰

问 林老师，您好！我们是“孙中山研究口述史”项目组。您是孙中山研究的名家。首先请您回顾一下自己的学术历程，是什么原因使您进入历史系，毕业后又从事孙中山研究？

林 我对中山大学仰望已久。考大学时我第一志愿就填报中山大学历史系，1958年我真的如愿考进中大历史系。当时历史系陈寅恪先生是一级教授，他知识渊博，懂十几种外文，写书引经据典，做学问以小见大，我感到很自豪；而且资料室里摆着许多历史系教授的著作，我们可以经常去借阅。但那时候，我刚进中山大学，年纪还小，根本看不懂这些著作，又感觉离我们很遥远。那时候的我就是这样一种既自豪又懵懂的心态走进中山大学的。

至于报历史系的原因，那是因为我有一位比我高一届的师兄和一位比我高两届的师兄，均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就读，他们时常跟我谈起历史系有很多名教授，如陈寅恪、岑仲勉、杨荣国、刘节、梁方仲等人。那时还是小孩子的我，虽不了解这些教授的专长，但仍心生向往，所以也选择报读了中山大学。

问 陈序经教授当时不在历史系吗？

林 陈教授也在历史系担任教授。但在我读书时，他是学校的副校长，所以更多的时候他是去负责后勤方面的工作。我们虽然很少能见到他，不过他确实是一位好校长。

问 可以说，您的一生与中山大学历史系结下渊源。您一毕业，就到研究单位工作研究历史，至今虽已退休仍笔耕不辍，可以说您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史学专业，而且您对孙中山研究也是情有独钟。请您讲讲您毕业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机缘，让您一直坚持走史学研究这条路，以及坚持孙中山研究？

林 我第一志愿就报读中山大学历史系，这是跟孙中山对我的影响有关系。但实话实说，当年我对孙中山也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领导了辛亥革命，创办了中山大学，其余的方面也不太了解。但进了学校以后，受到学校氛围的感染，受到孙中山思想的陶冶，感觉变化很大。原来学校的图书馆（即今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办公大楼）旁边，就是孙中山铜像，平时没有进馆之前，我会在铜像附近走走，多看看他这个形象。长此以往，孙中山的形象便深深地映在我的脑海里面。我们读书的年代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年代，所以我们读了五年书。我们系的老师陈锡祺先生是研究孙中山的老专家，但他也没给我们上过孙中山的课。他讲的课程是广东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在那个年代，他只能讲这样的课程，不可以谈到资

产阶级的领袖孙中山。但耳濡目染，我们也从各个方面看到一些与孙中山相关的资料，虽然还是不甚了解，但是也慢慢开始对孙中山怀有一种仰望和崇敬的心情。

我在中大读了五年书，除三年的基础课，还有两年专门化的课程。专门化的课程，当年我们历史系有三个专门化课程班，一个是中国古代史，一个是东南亚研究史，另一个就是教中国近现代史，而且这三个研究方向都是中山大学历史系老师研究的强项。我选择了中国近现代史，至于原因，我当时觉得世界史、东南亚史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古代史也相对离现实很远，所以我选择了一个离我比较近的专业——中国近现代史。在两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学习中，我受益良多。当时的陈锡祺先生、金应熙先生，都是我们历史系很重要的老师；还有一帮年轻的老师，像陈胜彝老师、骆宝善老师等等，这些老师都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方向的，我们学生整天跟他们一起学习，一起讨论，一起劳动，一起考察，我们到过虎门、三元里考察，也看过广州抗英炮台和社学的遗址等。我看了不少相关的史实后，就觉得十分压抑，产生了一个念头——我们近代中国确实是多灾多难！中国堂堂一个大国，人口众多，土地辽阔，为什么却积贫积弱，为什么却被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甚至在世界上都没有什么地位。正因为这样，我才慢慢地领悟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之处。在那个年代，虽然中国人才辈出，包括太平天国的洪秀全，还有广东省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诸如此类的进步人士还有很多，他们都是改革者，

也是爱国者，他们一心想要改革我们的中国，让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独立起来，他们都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个人认为，最伟大的还是孙中山。在社会动荡之际，孙中山敢为人先，提出先进的思想，立志救国救民，这是很不容易的。

在珠江三角洲，在中山市翠亨村，出现了这样一个人，我就特别好奇他到底是不是天才？事实证明也不是。在青少年的时候，他应该跟其他珠江三角洲的青少年也差不多。他要劳动、要上山砍柴、要放牛，这些工作也是一样的。但是他的思想的确跟其他人不同，他的性格有点叛逆，有些青年的想法比较保守，而孙中山就会想到为什么中国那么糟糕，是因为清政府不好。他年少时就说，要是洪秀全、太平天国把它推翻就好了，他就有这种敢于破旧立新的志气，就这方面看孙中山又是一位从小爱思考、想问题的人。

另外从地理环境来看，中山翠亨离香港、澳门比较近，华侨也相对比较多，外来的思想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在这里传播。他从小虽也跟别的孩子一样念“四书”“五经”，但一些新的思想、新的信息的传入，慢慢地在他的脑子里产生了变化。到后来年岁渐长，他随母亲乘轮船到檀香山，始见“沧海之阔，轮舟之奇”，视野和格局就打开了。这些思想逐步开始潜移默化对他产生影响。在檀香山这几年里，他种下了革命的种子。然后他回来香港读书，他的革命思想慢慢形成，也为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因为这些经历与见识，我产生了

对他的崇敬之情。本来我打算毕业以后留下来研究孙中山，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但结果我却被分配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级让我去研究少数民族，当然少数民族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我在这方面没有很大的兴趣，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以后，我在北京工作了13年。

问 您在北京待了13年都做些什么研究？

林 转眼就13年了，在这期间，我没有研究过中国近现代史，但是我非常幸运，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时，很多人出去造反闹革命去了，而我没有去闹革命，也没有造反，我就专心致志地跟着一些老先生研究和编撰中国的历史地图。编撰中国历史地图的工作是由复旦大学的谭其骧先生主编，陆陆续续出了13本历史地图，我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就负责编撰新疆地区从古至清代的地图，还编写历史地名考辨，历代西北边界的材料。新疆、西藏是连在一块的，这也是当年俄国、英国争夺过的地方，我在编撰地图的过程中，看了许多中外著作，受到很大的刺激，我对中国的贫弱状况、民族的羸弱以及“落后就要挨打”感慨良多。这个工作一做就做了五六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就在从事这项工作。工作顺利完成以后，我得到了一个机会，我读书时的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杨荣国教授，上级让他编一部《中国通史》，他便到处去寻找人才。杨教授当时有病在身，住在北京的协和医院，我跟我们的同学时常去看望他。一

次探望的时候，他就谈起这个事，他说我们在编《中国通史》，由金应熙先生来主持，现在正是需要人的时候，同学们要是愿意回母校帮忙撰写的话，欢迎同学们回母校母系工作。当时比我高两三届的、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黄宣民师兄也去看望杨教授。一听杨荣国老先生提起这个事，黄宣民就说：“林家有适合干这个事，把他调回去工作吧。”我就回答道：“杨老先生，让我先考虑考虑再决定吧。”因为当时我的夫人、儿女都在北京，工作、生活都很不错，我也没有回来广东的打算。后来杨先生说，“别考虑了，不用考虑了，就这样定了！”本以为是句玩笑话，结果弄假成真，往后杨教授就写信给当时中山大学的校长李嘉人先生，请他把林家有调回中大，参加《中国通史》的撰写工作。李嘉人校长做事很迅速，很快就把调我回中大工作的报告上达到省委。省委主管文化教育工作的宋一平副书记，很快就批下来，调令便到了北京。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事局却说不能让我调走。我说怎么不能走？我是广东人，中大又是我的母校，我是学中国近现代史的，我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有兴趣，所以我应该回去。他们的回应是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曾考虑把杨荣国调到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当所长，所以仍以杨荣国助手的名义来调动不太合适，后来一直僵持着不肯放人。于是中山大学就派了原来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调中大当总务长的戈平同志，以及哲学系的刘焯教授两人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活动，也到我爱人的单位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找我谈过几次，由于我去意

已定，经过商量，197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终于同意让我调回了中山大学。

回到广东时，“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杨荣国先生主编的《简明中国通史》分古代史组、近代史组。近代史组，有张磊、黄彦、方志钦、张难生、段云章、骆宝善、林家有，还有四位工农兵同志集中在广州市黄华路的省委党校，编写《简明中国通史》近代史部分，一编就编了一年多，撰写出一部《中国近代史稿》。“文化大革命”后期，杨荣国先生也遭到批判，说“四人帮”利用他，批林批孔，《简明中国通史》编写变得举步维艰，书没有公开出版，《中国近代史稿》印出来作为中大历史系教材使用了几届。编写组只好遣散，我有几个出路，一个是继续跟着哲学系的李锦全教授研究思想史，另一个就是回归本行，回到人类学系跟梁钊韬先生重新研究民族史。后来历史系的陈锡祺先生、陈胜彝先生坚决要我回历史系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我就听了两位老师的建议，决定回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问 你回来的时候是哪一年？

林 大概是1978年。回来以后，历史系成立了一个孙中山研究室，陈锡祺先生是研究室主任，我当秘书，我得配合他的日常工作，来做孙中山研究。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走入孙中山研究这个行当，现在算起来，也有三四十年了。

问 有三十多年了，不是跟改革开放同步吗？

林 对，三十多年了，我对这方面的研究非常执着。我欲罢不能，天天起来都在阅读孙中山的书。我看的书越多，就越觉得孙中山了不起，伟大的时代正需要这么一个伟大的人。所以长此以往，我这一辈子就贡献给孙中山的研究事业了。刚开始，我是一段时期、一段时期地进行研究，陈胜彝教授做了历史系主任以后，因为中山大学是孙中山创办的大学，所以学校认为孙中山研究非常必要，就由研究室升级为研究所，陈锡祺先生当第一任的孙中山研究所所长。我和段云章两个教授当研究所的副所长。后来陈锡祺先生退任了以后，陈胜彝先生当第二任研究所所长，我跟段云章老师还是当副所长。陈胜彝先生下来以后，我就继任当研究所所长。一当就当了几十年，这样我与孙中山研究就更加不离不弃了。

问 从那时开始，您已经踏上孙中山研究这条道路了。当时毕竟还是刚改革开放，“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左思想会有所影响，而孙中山研究本身在思潮上肯定会产生变化。请您谈谈当时广东乃至国内整个孙中山研究的学术环境？

林 因为当时还是处于“文化大革命”后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孙中山研究室是1978年成立，1979年后改为孙中山研究所。过去有人说，广州是文化沙漠，不重视学术研究，我是不太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广州这个地方适合做学术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外国、港澳台的

许多学者到广州进行学术交流，到中山大学访问的学者也不少。1979年11月，我们在广东流花宾馆就开了第一次“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到了外国的学者，香港、澳门、台湾的学者也参加了研讨会。这次会议影响也很深远，从这个会议开始，广东的学术研究氛围就慢慢好起来了。这个好，好在哪里？往后的时期，外国学者汹涌而来，来到广州，到中山大学来，其中包括美国的著名孙中山研究专家韦慕庭，以色列的史扶邻，德国的金德曼，日本的野泽丰、山口一郎、藤井昇三，以及台湾的吴相湘、香港的王德昭等都来过中山大学交流。

1979年韦慕庭来中国访问，到广州住在白云宾馆，他专门约见陈锡祺先生，我陪陈先生到白云宾馆见面。他的中文讲得很好，不用翻译就开始愉快地交谈。我就坐在旁边听他们谈。其间，也有谈起他们两个人对孙中山研究的一些看法，谈起孙中山的伟大之处，他们的谈话内容对我的影响很大。韦慕庭还把他一本研究孙中山的英文著作赠给孙中山研究所。我也翻阅了一下，英文我还是略懂一点，拜读以后，我真心觉得这本书写得好。他利用世界各国有关孙中山的资料，尤其是俄国的档案，就几个问题进行探讨，分析深刻到位，资料很翔实。后来湖南师范大学林增平先生请我去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我就把这本书带到了湖南长沙，交给了湖南省科学院的杨慎之先生，他的英文好，中文也好，我就请他翻译这本书。翻译完成，中文的书名是《孙中山——壮志

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出版。这本书出版以后影响很大。从此，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就同世界各地的研究者加深了联系，研究也就一步一步地往新的方向发展。

陈锡祺先生首先是布置我们所里同仁到外地搜集孙中山材料编《孙中山全集》，然后做专题研究。他安排段云章、邱捷先生研究孙中山与近代中国军阀；安排李吉奎先生研究孙中山与日本；安排我和周兴梁研究孙中山与国共第一次合作。我们花了两三年时间把这几部书编写出来。这几本书出版以后，反响比较好，得到了不少好评，也被评为优秀著作。此后，学校也更加重视孙中山研究了，我们开研究孙中山的学术会议不少，开会多了，学者自然来得也多了。后来我们就办了一个不定期的刊物《孙中山研究论丛》，出版了16期，反响还是蛮大的。章开沅先生说：“作为一本不定期的刊物，在同等级的孙中山研究水平里，这本杂志在全国甚至在世界来说都是一流的。”

问 后来孙中山研究所又编了《孙中山年谱长编》，影响更大了。

林 是的，后来陈锡祺先生还主编了《孙中山年谱长编》，花了三四年时间。这个书出版之后得了几个奖项，一个是国家教育部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一个是孙中山基金会的优秀著作一等奖，还有一个是全国优秀图书一等奖。从此以后，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的

基础就打下来了。在广东，在中国，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的地位便确立了。之后我们就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张磊先生、黄彦先生等经常合作，开会、编书，1996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孙中山基金会丛书》，这套丛书有几部就是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同仁的著作。通过广东学者的努力，就奠定了广东省孙中山研究的地位。谈到孙中山研究的过程，我之所以有幸走到这个行当里，有两个人我是不能忘记的，一个是章开沅先生，一个林增平先生，这两位先生不仅学问好，人品也好，对我给予扶持，我非常感谢他们。

问 我们知道您曾参加了他们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的写作。请您谈谈与两位先生的合作。

林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时，我就认识章开沅先生，他当时在《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我的老师胡守为先生也在《历史研究》编辑部，经胡老师推荐我有幸在北京拜见章先生。胡守为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也被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工作，我经常到北京和平饭店《历史研究》编辑部去拜访他。胡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史，章先生研究中国近代史。认识章开沅先生后，他跟我谈了很多。他的思维很开阔，看问题很有深度，我很是钦佩。在他离开北京之前，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请他指教，写的是《满族人民对辛亥革命的贡献》。我把这篇文章拿给章开沅先生看，他认为这样的文章还没有人做过。后来不久他就回华中师范大学，我也调离北京到了中山大